

冯玉忠

# 形势问题对话录

辽宁人民出版社



## 形势问题对话录

Xingshi Wenti Duihuolu

冯玉忠 著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字数：61,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1/2

印数：1—30,000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

责任编辑：王大路

版式设计：任 和

封面设计：李国盛

责任校对：王绍城

---

ISBN 7-205-01001-2/D·188

---

定 价：1.25元

## 前　　言

近几年，中国出现了众多的“热门话题”，兴起了“热门话题”热。虽然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热门话题”的内容往往有所区别：工人谈奖金，农民谈农膜，知识分子谈职称，青年学生谈出国。但也有共同的“热点”：开始是党风、社会风气，接着是“官倒”、“太子”，后来是物价、腐败，现在则归结到改革、改革的形势。当前，“形势”是最大的“热门话题”，是人们议论的中心。

人们对形势的关心，起始于身边“琐事”，就事议论，后来扩展到社会普遍性问题，议论国事；最初是个人、个人所在阶层社会地位的升降，获益的多寡，后来提高到改革的进退，民族的兴衰；开始是富于感情色彩的即兴议论，现在则有较多的人开始了理性的思考。

人们对形势问题的思考，大都遵循着这样的思想进程：首先是社会问题、改革状况的静态思考，接着

是十年改革的纵向思考，进而是新中国40年的历史反思；有些人还对70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史进行了总体反思。

这种思考得出了什么结论或将会得出什么结论，暂且不论，这么多的公民从对个人得失的议论提高到对国家兴衰的关切，由个人情感的宣泄升华为民族振兴的思考，这就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征兆！改革是民众的事业。民众的关心，民众的议论，民众的思考，民众的参与，民众的改革热情和自觉行动，是改革大业冲破艰难险阻、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一人思考、万人行动，一人说话、万人照办，这种“短期行为”虽能收到一时热闹的“立竿见影”的效果，但绝不会带来民族的长久振兴。

当然，这种议论，这种反思，原也有过，比如真理标准的讨论，且收到了巨大的思想成果和物质成果，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十三大的初级阶段的理论，就是这种历史反思的最伟大的成果；也带来了巨大的历史进步，其中包括今天人们的能够议论纷纷和敢于议论纷纷。但是，不可否认，当时的“议论”、“反思”，主要是政治家的事、理论家的事，这并不等于否认广大民众对这种“议论”的关心。当政治家

根据自身的和理论家的思考，代表民意，做出改革的决策，并把改革的“事实”、进一步改革的任务“推到”每个公民面前的时候，在改革开始唤醒了广大民众的“公民意识”和本来意义上的“主人翁责任感”的时候，民众的思想便“行动”起来，于是便产生了纷纷议论。人们对改革的认识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不能一次完成的，只能随改革的进行和历史的前进而不断深化。政治家和理论家也是这样。改革遇到的现实问题和民众的纷纷议论，又推动政治家和理论家对改革进程进行反思，对历史进行再反思，并把这种理论和政策实践的反思与广大民众对形势的议论、思考结合起来。如果说十年前的理论讨论、历史反思，产生了改革决策和改革行动，那么今天有广大民众参与的形势讨论和历史再反思，必将会带来改革的深入发展和民族的兴旺发达。

当前，民众对形势的议论，有相当一部分还停留在即兴发挥的初级阶段，甚至大量表现为仅属情绪发泄的牢骚，这集中表现在一些编传的顺口溜和民谣上。它的广泛存在，虽然能够反映出我国民主空气的空前浓厚，但也反映了我国政治民主机制的不健全，虽然从中能够体察到不同阶层民众的心理和情感，但

也反映了思想政治工作的软弱无力。把民众自发的即兴议论和牢骚提高为冷静的思考，自觉的议政、参政，有赖于政治体制的深入改革，也有赖于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和加强。

怎样认识改革的形势，认识人们对形势的议论、牢骚？如何通过讨论把人们的议论、牢骚提高为对改革形势更深层的思索？许多思想政治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都做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辽宁大学校长、经济学家冯玉忠教授自1988年以来从他所处的教育环境和他所熟悉的企业家环境中，感受到了研讨形势问题的迫切性；从他与家乡群众的密切往来中，获得了普通民众对形势问题关注议论和评价的信息。于是，他便用忧国忧民的深情，用经济学、社会学的知识，对形势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索和研讨。半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在校内外做了40多场形势研讨报告，使听众大受启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十几家报刊摘发了冯玉忠报告的要点，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通常的形势报告相比较，冯玉忠报告具有以下突出的特点：

第一，他抛弃了“说教式”的传统做法，摆实情、讲真话，和听众平等地交流信息和感情，以情感

人。

传统的形势教育有两大弊端。一是多采用我说你听、我教你记的教师爷上大课的方式进行。形势认识问题是包括报告人在内的广大民众的共同课题，报告人和听众的关系本不是先知先觉的先生和接受教育、有待提高的学生的关系，报告人却硬要端着教师爷的架式进行说教，这怎么可能打动听众的心？二是按照事先拟定的宣传材料进行讲解，所列的材料大都不是听众身边的实事，所讲的道理报告人又未必完全理解，并不都是自己的心里话，听起来使人感到“水分太多”、虚假，这怎么可能说服听众？

冯玉忠的报告多采用对话、研讨的方式，从听众共同关心的问题讲起，所摆的大都是听众身边的实事，所讲的都是自己的真实感受和心里话，并且取平等交流的态度，而不是强加于人。讲心里话，才能引起共鸣；情真意切，才能打动人心。这是冯玉忠报告所以能够受到不同阶层听众普遍欢迎的重要原因。

第二，他以一个改革理论家的社会责任感，从现实问题中，寻找理论课题，把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提高到理论高度来认识，并结合实际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和见解，以理服人。

改革需要理论的导航，改革的形势、改革中的问题也需要理论的阐释和说明。就事论事，“忆苦思甜”，只能得到一时的似是而非的满足，遇到新的问题还会产生新的困惑，只有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对现实问题作出理论的回答，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困惑。因此，形势研讨，形势教育，也需要理论的“导航”，需要理论家的参与。同时，理论家也只有研讨改革中的现实问题，才能找到理论的生长点，才能发展改革的理论，成为时代所需要的改革理论家。理论的参与，理论家的参与，既是深化形势教育的需要，也是发展改革理论的前提。

冯玉忠同志一方面以自己的理论“敏感”，及时抓住改革中的“热点”问题，开展自己的理论研究，一方面又以一个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参加形势研讨，对群众关心的“热门话题”作出理论上的回答。因而他的报告既有“情”的感人魅力，又有“理”的说服力量。

第三，他的报告并不企图给人以什么结论，叫人“深信不疑”，而是通过自己的分析，给人以方法的启迪。

当前人们对形势问题的困惑，大都不在“事实”

本身上，而是如何看待“事实”。地球本身就是圆的，人们站在不同的方位，得出不同的结论实属必然。这就有一个观察形势的“角度”问题，判断是非的“标准”问题，分析事物的“观念”问题。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和发展，十年改革中的诸种难题大都与前30年的历史实践相关联。割断历史的联系，静态地观察形势，很难看出问题的性质和症结，很难看清前进的方向。冯玉忠的报告从历史和全局出发，在历史的反思中寻求现实问题的答案，并着力在“标准”、特别是“观念”上作文章，而不在“事实”本身上兜圈子。他的报告虽然大都没有提供关于“事实”的具体结论，却常常能给人以较长久的回味。

第四，他的报告带有一种民族忧患感和中国公民振兴中华的时代责任感，充满了改革意识。

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凝聚力很强的民族，但近代以来却在封闭中、自以为“中央大国”、“革命中心”的陶醉中落伍了。改革、开放，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唯一道路。排除障碍，冲破险阻，不屈不挠地把改革事业进行下去，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冯玉忠的报告自始至终贯穿着这种历史责任感和

强烈的改革意识。可以说，改革是他每一场报告的主题、主旨、主旋律；打动听众的“情”就是这种改革的激情，说服听众的“理”也就是“改革是振兴中华必由之路”的道理。

这就是冯玉忠的报告深受各界欢迎的原因。

这也是我们把冯玉忠的多次报告的内容，经过小范围的“再研讨”，编辑成册的原因。

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我们邀请冯玉忠同志和于信凤、邹德安、高凯征、王长林、刘玉良诸同志与本书的编辑一起，在每日的班后，聚到一处，就形势问题及冯玉忠报告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王巨禄同志也参加了讨论。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副会长王维澄、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邵华泽同志分别阅读了书稿，并提出很多宝贵的意见，对本书的编写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在讨论中，气氛之热烈，话题之广泛，争论之激烈，常使四邻不宁；几乎每晚都“侃”到零点之后，但“侃兴”犹浓，恋恋不肯散去。通过这种讨论，每个人对形势的认识和思想的境界都有很大的提高、很多的收获。尔后，参加讨论的同志又协助冯玉忠把多次报告的内容加以整

理，并做了进一步的充实与深化，便形成了这本《形势问题对话录》。

冯玉忠是经济学家，《对话录》谈得较多的是经济问题、经济理论、经济观念，这丝毫不意味着改革问题、形势问题仅仅表现为经济问题。参加研讨的同志，包括冯玉忠同志本人都认为，现代化是全方位的，改革也是全方位的。单打一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成功，自不必说；任一领域的改革的过分迟缓也会扯其他领域改革的后腿。当前的形势问题，许多就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政治民主化进程不能适应改革、开放的整体需要造成的。但是，每场半天的形势报告，又不可能谈论到改革中面临的一切问题，只能侧重谈论某一些方面；而作为已经进行过的形势研讨报告的《对话录》，把原已侧重的方面适当扩充、深化是适宜的，如用较多的笔墨（少了说不清楚）增加其他方面问题的分析（譬如把写作期间研讨的内容都写进去），则有些不大协调，并且时间也不允许。这是出版本《对话录》时，需要说明的。

再好的形势报告，也只是“一家之言”。它的作用仅在打开或拓宽听众和读者的思路，启发人们对现实问题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思索，使民众对形势的

议论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任何企图通过形势报告来“规划”人们的思路、实现“舆论一律”，都是错误的，也肯定是要失败的。这本《形势问题对话录》，如能引起读者对形势研讨的兴趣，促使人们对形势问题进行更深的思索，激起人们的改革热情，那就是本书作者和编者的最大愿望了。

### 编 者

1989年3月22日于沈阳

## 序 言

王巨禄

辽宁人民出版社将冯玉忠同志的《形势问题对话录》整理成书出版，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不论是机关、厂矿，还是部队、学校，形势教育仍是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形势教育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起点。形势教育的关键在于引导人们正确地看待形势，用正确的方法去分析形势。我愿借本书出版的机会，谈一下我对形势教育的一些基本想法。

搞好形势教育，首先是要全面、深刻理解好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实质。改革和建设要求治理、整顿。治理、整顿，这既是今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也是为今后改革开放、建设和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大家知道，当前我们国家在经济生活领域遇到了一个突出的问题，即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已经影

响到我们经济的稳定，同时使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进行。另外在改革、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宏观失控，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以及与这些混乱现象有关的消极现象，这些混乱现象和消极现象已经影响到我们党和政府的威信，影响到党和政府的权威。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就要成为改革开放和建设的障碍。所以，三中全会确定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在贯彻三中全会的过程中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治理、整顿和改革、建设的关系是一致的，在认识上实践上既不应该低估治理、整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不应把治理、整顿和改革、建设对立起来。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是在充分肯定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决不动摇改革方向基础上和前提下，面对当前改革、建设中出现的一些突出问题，在改革步骤、方法和一些局部问题上做出的战术性调整，决不能把三中全会精神理解成是总体改革的倒退，改革大目标上的调整，改革总方针总政策的改变。因此，我们在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时候，一定要处理好治理、整顿与改革开放的关系，要把它跟大家讲清楚。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在实践中由于情况繁

杂，具体工作上掌握不当，也可能会给改革带来某些副作用，甚至很可能把改革的某些方面拉向倒退。只要认真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当前我们遇到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这是肯定无疑的。至于会不会出现一点副作用，完全有可能。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尽量地减少这种副作用。认识上清醒了，在实际工作中就能把可能出现的副作用减少到最低限度。所以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必须坚定不移。总之，贯彻好三中全会精神，开展形势教育，首先是我们做宣传工作的同志要在学习文件上下功夫，要全面、正确的理解好中央精神，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理解好，也搞不好对群众的宣传和引导。

1. 正确认识形势，应该坚持一个根本标准，这只能是生产力标准，而不应该是别的标准。因为别的标准随意性太大，不能从全局和本质上反映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不可阻挡之势蓬勃发展，10亿人口的绝大多数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我国经济建设发展战略第一步的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跨入新的天地，民族精神获得巨大解放。这些成就的取得归

根结底是因为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关于生产力标准，十三大报告讲得很清楚。经过近40年的经验教训，我们才找到了这个标准。它是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无疑也是判断形势的根本标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最大的拨乱反正，是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定改革开放的总政策，明确现阶段我们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用生产力标准看形势，会清楚地看到这个主流。另外，当前看形势，不要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即紫阳同志讲的：“改革对于中国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更重要的在于它结束了封闭和停滞的局面，开辟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看形势，既要看到改革带来的现实好处，又要看到改革给民族带来了长远利益。既要看到物质成果，还要看到精神成果。看到了这些主流，才能坚定改革的信心，看到改革的希望。

至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经济过热，“官倒”以及一些腐败现象等等，当然我们必须认真解决。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少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在改革的过程中，主要是旧体制的弊端一时还不能完全消除。新体制的框架尚未建立，宏观调控不足或失控的现象常常发生。

此外，有些改革措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具体工作在决策、操作过程中也有失误，也需要承认。已经暴露的问题必须治理和整顿，不这样，党和政府的威信受影响，广大群众改革和建设的积极性难以充分调动。但是，在分析当前形势的时候，还需冷静的认识 到，在我们这个发展中的国家，亿万中国人民的改革和建设实践，从一定意义上说都带有探索性质。要求改革和建设过程中，只有成功，没有失败，只有顺利，没有曲折，是任何一个“天才”的领导集团也办不到的。正确的选择应该是不因挫折而悲观，不因失误而模糊方向，动摇信心。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全党上下、全国人民需要的是更加同心同德，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改革是历史前进的大潮，改革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改革的最终胜利必然属于全体中国人民。

一切新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都是利弊共生的，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必然伴生着一些消极现象，一些问题和困难。这是支流。但要正视，要采取有力的措施去解决。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整顿和全面深化改革方针，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和困难的。这些问题和困难是改革的严重障碍，也是生产力